

中央民族大学国家“十五”“211 工程”建设项目

民族研究文集

(学科建设与应用研究卷)

张海洋 主编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族研究文集. 学科建设与应用研究卷/张海洋主编.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6

ISBN 7-81108-167-9

I. 民… II. 张… III. ①民族学—文集②民族学—中国—文集 IV. C9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1465 号

民族研究文集(学科建设与应用研究卷)

主 编 张海洋
责任编辑 张 山
封面设计 马钢工作室
出 版 者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27 号 邮编:100081
电话:68472815(发行部) 传真:68932751(发行部)
68932218(总编室) 68932447(办公室)

发 行 者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20.25
字 数 510 千字
印 数 2000 册
版 次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1108-167-9/ C·69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民族学社会学教材与研究丛书总序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前身是建立于 1952 年的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研究部曾汇聚了中国大部分民族学与社会学的顶尖人才，如中国民族学与社会学的开拓者潘光旦、吴文藻、杨成志、吴泽霖、费孝通、林耀华和李有义等人，以及他们的学生陈永龄、宋蜀华、施联朱、王辅仁、吴恒和王晓义等著名学者。

20 世纪 80 年代初，研究部更名为民族研究所，不久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民族学系，20 世纪 90 年代扩大为民族学研究院，2000 年更名为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半个世纪以来，名称和建制的变化，并没有影响她致力于民族学教学与研究的宗旨，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从该院毕业的民族学专业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已遍布全国各地，多为栋梁之材。同时出版了大量在国内影响巨大的专著和教材。如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等人的文集，林耀华主编的《民族学通论》、宋蜀华的《民族研究文集》、陈永龄的《中国民族学史》（英文版），还出版了全所历年研究成果的论集《民族研究论文集》。这些出版物的共同特点是，以实地调查的材料为基础，以中国的 56 个民族为主要研究对象。几十年来，这已成为民族学与社会学院几代人的学术传统。

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毕竟是一个自西方传来的学科，在中国发展历史较短，几十年来又多次受政治运动的影响，所以与我国一些传统的老学科相比，中国的民族学无论在专业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成果方面，都是一个比较年轻、比较薄弱的学科。因此，今后本学科的重点是加强民族学专业的基础理论和方法的建

设。为此，我们认为需要长期坚持两个方面的工作：

一、积极了解和借鉴国外学者有关的理论、方法和实践。这就要求我们既要翻译、介绍国外一些经典的名著，又要随时掌握国外研究的动态，将其最新的代表性作品翻译介绍给国内的读者和同行。

二、也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继承我院 50 年来的传统，坚持实证性的研究方法，以中国的 56 个民族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紧密联系实际，加强实地调查，以此为基础，进行理论的总结，为建立独树一帜的、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理论而努力。

我们认为有必要使我们的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进一步系统化、规范化，并且在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断更新我们的教材。因此，我们于 2000 年成立了“民族学教材与研究丛书编委会”，目的是以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为基础，系统地编辑出版民族学专业的教材和以实证性研究为主的专著、调查报告和论文。编委会将重点支持以下内容的教材和著作：

1. 民族学专业主干课和紧缺的必修课教材。
2. 以实地调查资料为基础的专题研究著作。
3. 国外民族学名著或前沿理论与方法的译著。
4. 有重要学术资料价值且规范的田野调查报告。
5. 本院教师实证性研究的论文集。

我们要求教材的编写者，应具有多年讲授该课程的资历，并且发表过有关的研究论文。我们要求丛书中的教材和论著应参考并引用国内外最新的相关研究成果，能够与国际学术界对话。我们希望经过若干年的努力，本套丛书能够为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50 年学术传统的发扬光大，为中国民族学学科的建设和中国民族学在国际学术界中较高地位的确立做出贡献。

杨圣敏

目 录

费孝通先生对学科建设的指导

- 先见者的智慧 杨圣敏 (1)

论学术研究的综合性取向

- 从潘光旦先生学术生涯谈起 王建民 (5)

宋蜀华先生对中国民族学理论的探索 王庆仁 马丽娟 (21)

民族志的特点与方法 杨圣敏 (40)

费孝通类型比较法的理论与实践 包智明 (58)

人类学调查研究中定量方法的应用 包智明 (78)

计算机给中国民族学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陈长平 (84)

民族学人类学的人口研究 陈长平 (91)

四合院的文化内涵及 N 院的空间分析 陈长平 (129)

女性人类学与中国女性人类学研究现状分析 戴成萍 (155)

关于21世纪生态民族学的思考 祁庆富 (170)

人类学本土化或中国化探讨的共识

- 读《人类学本土化在中国》随感 王庆仁 (182)

体质人类学的文化视野 戴成萍 张海洋 (195)

生态人类学的主要理论及其发展 任国英 (207)

经济人类学理论前沿综论 施琳 (225)

论经济人类学中的“形式”与“实在”之争 施琳 (248)

田野工作与艺术人类学、审美人类学

- 学科建设 王建民 (262)

21世纪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理论建设 王庆仁 (277)

20 世纪前半期的瑶族研究	王晓莉 (299)
“边政”与台湾边政研究	吴楚克 (309)
关于新疆史前研究的讨论	肖小勇 (327)
从中庸之道看中国人的感情特点	董 研 (346)
伦理文明发展与建设中的“情与理”	吴楚克 (352)
侗族村落的人文寓意	杨筑慧 (360)
我国民族学专业教材的创新之作	
——《中国民族志》评介	戴成萍 (375)
探讨在创新教育中综合能力和实践能力的	
培养	李 冰 (384)
关于生态移民的定义、分类及若干问题	包智明 (397)
从医疗保险制度看国有企业中的依赖关系	
——北京市某国有企业的个案分析	董 研 (407)
论经济体制改革对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影响	董 研 (417)
赫哲语的濒危状况及其成因	何俊芳 (426)
赫哲人的族际婚姻	
——关于同江市街津口赫哲族乡赫哲人族际	
婚姻的典型调查	何俊芳 (437)
滇东北多民族杂居山区生态贫困问题的调查分析报告	
——以永善县伍寨彝族苗族自治乡为例	
.....	侯远高 杨洪林 (449)
导致少数民族青少年感染艾滋病的行为、心理及其根源	
——以凉山彝族外流人口为个案 ..	侯远高 张海洋 (461)
信息化建设与社会和谐发展	李 冰 (471)
自主创新实践中的创造性标准把握问题	李 冰 (483)
自主创新与自主知识产权保护	李 冰 (501)
论西部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徐万邦 (512)
侗族妇女外流问题初探	杨筑慧 (526)

高新技术开发区与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	张国杰 (537)
德昂族社会经济发展现状综合调研报告	侯远高 (553)
独龙族社会经济发展调查研究报告	侯远高 (563)
普米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现状调查研究报告	侯远高 (580)
一个藏族社区的社会文化变迁 ——以卓尼县为个案研究	牛菊奎 (593)
人类学中的生态学方法 [英] 克里福德·格尔兹著 贾仲益译	(607)
文化生态学的概念与方法 [美] 朱利安·H·斯图尔德著 贾仲益译	(620)
后记.....	(639)

费孝通先生对学科建设的指导

——先见者的智慧

杨圣敏

在国际学术界，费孝通先生被公认为是一位卓越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凡读过他的书的人，无论国内和国外，无不承认，他在这几个领域都具有渊博的学识。他的数十部专著，将成为这几个学科永恒的财产而流传后世。

除了学识渊博，费先生还有另外超人的一面，就是他的睿智。凡是与费先生有过较多接触或是真正了解费先生生平的人，都会感觉到这一点，特别是他在面临各种社会的转折或风浪时所表现出的那种先见者的睿智。

正是凭借学识的渊博和智慧，近几十年来，在我国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几个学科的发展之路上，费孝通先生始终是一位舵手、一位指路人。

这几个学科都是 20 世纪以后自西方传来的。为了将这些西方产生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中国社会和民族的研究，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费孝通先生的老师，当时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吴文藻先生就提出了将这几个学科“中国化”的任务。他说：必须建立一个“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上”的社会学、民族学和人类学，使这些传自西方的人文科学“彻底中国化”。并且他和时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潘光旦先生以及他们的学生费孝通、林耀华等人，终其一生都在为此而奋斗。吴文藻先生还提出了用人

类学和民族学的方法来改造当时的社会学的主张。实际上就是主张这三个相近学科的结合。他所提倡的“社区研究”就是这三个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自那以后的70多年来，在本土的研究中实现“中国化”，并且将三个学科的理论方法相结合，就成了中国学者的传统和一直遵循的指针。

依据这样的传统，在20世纪30和40年代，中国的社会学、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产生了一批在国际学术界卓有影响的著作。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云南三村》，林耀华的《金翼》等。这些著作都难以单纯地定义为是人类学或社会学或民族学的著作。潘光旦、费孝通和林耀华等人也就既是社会学家，也是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

这几个学科在西方国家经过一百多年的独立发展，也逐渐走向互相的渗透与联合。如，在西方一些大学，人类学和社会学是在一个系里，称为人类学与社会学系。而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关系，国际学术界早已将其基本归为一类，即，民族学就是文化人类学。

20世纪5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社会学和人类学都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学科而遭取缔，但民族学却得以保留下来。于是，潘光旦、吴文藻、吴泽霖、费孝通、林耀华和李有义等人和他的学生，就集体来到了当时中国民族学的大本营——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继续从事研究与教学。这三个学科的研究也因此都以民族学和民族研究的名义延续下来。当时，费孝通先生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主管研究部工作。在此后开展的全国民族识别调查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研究部的学者们都担当了各支调查队的学术指导，使这些调查多少都能遵循一些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的调研规范。费孝通先生也以中央民族访问团副团长等名义担当了大调查的领导者之一。这些调查对新中国民族政策的制定影响深远，中国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生命也在这些实践中如“涓

涓细流，间而未断”（潘乃谷教授语）。

20世纪80年代初，人类学和社会学在中国的高校中得以全面恢复，中央民族大学的研究部发展成了民族学研究院和今天的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1982年费先生离开工作生活了30年的民族大学，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创建了社会学研究所，他又于1985年在北京大学创建了社会学研究所，亲自担任所长。在北大社会学系和研究所，费先生一直倡导社会学与民族学、人类学的结合，在博士和硕士的培养中一直有人类学方向。1992年，费先生又将社会学所改名为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所。1995年，在社会学所成立10周年纪念会上，他说：“今天我借这个纪念北大社会学研究所成立10周年的机会，同时纪念吴文藻老师逝世5周年。这两件值得纪念的事并不是巧合，而正是一条江水流程上的汇合点。这条江水就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流程。北大社会学研究所的成立和改名为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还有吴文藻老师一生的学术事业都是这一条江水的构成部分，值得我们同饮江水的人在此驻足溯源，回顾反思。”当年6月，在费先生的倡导下，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等国内多所大学的人类学、社会学和民族学学者及港、台和韩国、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学者老少咸集，汇聚一堂，开办了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此后这个研讨班延续了多年。在研讨班上，他说：“要开创一个新的学风，实事求是互相学习的学风，不搞门户之见。”他说这三个学科都是研究人文世界和人类的社会行为的，三科是一个集团，可以各有重点，又互相交叉。

1995年8月30日，已身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费先生又在自己家里召集北京的部分学者商讨，提出三科并立，将人类学也申报为一级学科的主张，这样就可以为这个领域的研究争取一个更大的空间。他说，如果大家有共同的意见，我可以管管闲事，

需要时我可以写信向有关方面讲讲我们的意见。遗憾的是他的这项主张受到个别学者的误解和反对而未能统一意见，从而搁置下来。

10年之后的今天，又有部分学者，包括当年反对费先生意见的人重提这个主张，并集体写信向教育部等部门提出申请。事情的结果如何，我们都在等待，同时，在等待中我们再次感到了10年前费先生的先见之明。费孝通先生地下有知此事，或许会微微一笑。我们猜想，以他豁达的胸怀，他的微笑中应该有欣慰也有宽容。

论学术研究的综合性取向

——从潘光旦先生学术生涯谈起

王建民

学术研究往往是不断积累的过程，如何更好地继承前人的研究成果，汲取他人的学术理论和材料，并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个人的意见，是学术不断进步的途径之一。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一样，遵循学术发展规则，尊重前人的学术经验之时，学科才能够健康顺利发展；反之，不遵守学术规则，置前人学术经验于不顾，则学科停滞，学者缺乏建树。本文谨以潘光旦先生的学术操行为鉴，说明学术研究综合性取向的意义。

潘光旦先生是中国著名社会学家、民族学家、优生学家。他学贯中西，学识渊博，学术造诣深厚，他的研究涉及许多领域。他到美国留学后，先在新罕布什尔州的达特茅斯学院学习生物学，以后又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修动物学、古生物学、遗传学，还进修过人类学、优生学、内分泌学、单细胞生物学等不同的知识。他讲授过的课程包括心理学、优生学、家庭问题、进化论、遗传学、西洋社会思想史、中国儒家社会思想史、人才论、社会主义思想史、马列主义名著选读、家庭进化史、英语、中国文化等。他主张通才教育，青年学生的教育培养一般要先博而后约，先打下广阔的知识基础，而后在某方面逐步专深。他一生学的是生物学，教的却是社会学，临时讲演的题目更涉及文史哲。

他的研究著作涉及社会学、优生学、心理学、遗传学、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等不同领域。^①

在学术研究中注意多学科的结合，正是国际学术界通行的策略之一。丰富的学术阅历、广泛的学科背景，才能够使学者从不同学科中获得营养，运用不同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以解决学术问题。国际学术界十分强调不同学科间的合作，在许多国际知名大学和学术机构，经常有各种形式的跨学科学术讨论，一些基金会还专门设立跨学科研究奖学金，鼓励博士学位研究生和青年研究人员从事跨学科研究。

阅读潘光旦先生的著作，人们可以发现，潘先生研究问题时通常采用综合性取向。所谓取向，是研究者怎样对所研究问题进行解释的态度。有些学者可能会采用坚持某一学术流派理论、固守某种研究方法的单一取向。但是，综合性取向是国际学术界更多的学者愿意选择和采用的。作为学术规范化的各门专业化的不同学科学术研究实践活动之间的一种相互关系形态，跨学科的研究是国际学术界的普遍要求。人们通过在理论分析、方法采用、资料处理等方面采用更开放的、总体的和多层面的态度，发展跨学科的综合取向。一方面人们为了不同学科的建设，强调学术规范化，建立学科的认同；另一方面，跨学科的研究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更强的解释力。可以说，专门化的学科训练是进行跨学科研究的基础，对不同学科知识的充分理解，才可能在更高层次上实现跨学科的研究。

潘光旦先生早期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优生学问题上。通常优生学十分强调生物学因素，但是以优生学家著称的潘光旦先生并没有简单地被优生学的占优势的理论模式所左右，他在阐述优

^① 参见全慰天：《潘光旦传略》，《中国优生与遗传杂志》第7卷第4期，1999年。

生学理论时，注意了各种因素对种族进步、民族改良的影响。他对影响文化现象发展的原因分析表现了很强的综合取向。他认为，文化演化受到许多很复杂的因素的影响，首先是社会因素，其次为心理因素，再次为有机的和生物的，最后是理化的因素，这些因素“都可以用引来解释文化；再加上文化现象自身的解释；这样综合的解释才比较圆满。”^① 在研究中，应当从更全面、更立体的观念来考虑研究对象，把正在研究的对象、正在探讨的问题看成是一个具有不同侧面的整体。简单地将某一文化现象的发生和演变归结为某一种原因，而排斥其他的考虑，是应当受到质疑的态度。综合的解释才可能使答案更圆满些。

在研究策略上，他也主张用多种学术理论、多种研究观察方法来对待问题。“只要我们求学问的时候，作观察与解释的时候，不把自己的一种学问当作唯一的学问，自己的观察法与解释法当作唯一的观察法和解释法，也不把别种学问、别种解释与观察忘记了，抹杀了或小看了，我们便算尽了人事。”^② 面对不同的研究对象，研究者可以选择不同的途径进行探索，也就是说可能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而潘先生倡导的这样一种运用不同的研究途径的策略，为人们丰富对问题的认识提供了具体的入手方略。

潘先生主张理论观点不宜过于偏颇。“我一向认为任何带有唯字的思想学说是不能健全的，是无法健全的，在主张它的人无论如何虚怀若谷，从善如流，总不免失之偏颇，失之武断，自己吃执一的亏，别人蒙抹杀之害。”他以唯本主义为例，中国一向有注重根本的传统，但过于重本，过于务本，造成唯本的伤感主义、务本而舍末和一本论的不良结果。由于唯本，对作为本的对象的态度长期侧重于情绪方面，而很少有理智的方面；遗忘了

① 潘光旦：《文化的生物学观》，《东方杂志》第28卷第1期，1931年。

② 潘光旦：《文化的生物学观》，《东方杂志》第28卷第1期，1931年。

末，导致不重视工商，不晓得对现在与向未来看，不晓得就现状中求改革，开拓迟缓，向外发展与冒险精神薄弱，国家意识形成较晚；一个人或一个时代始终只承认一个本，即不知道因时因地因事之宜，而转移本的对象，家族畸形发展，法治无由确立，国家组织不能巩固。但是，在严厉地批评唯本主义之后，潘先生指出：“旧日的弊病在唯本舍末，今日的弊病在忘本逐末。”并认为，“及今不图挽救，整个的民族与人类迟早会走上危亡的路。”^① 在学术研究中，由于采用的方法不同，解释同样的事件，可能会有各异的理论。从单一方法得出的理论往往会有一定的局限性，用综合性的理论取向去判断和评价各种理论，对不同理论的恰当运用有可能更为自如。

因此，观察研究对象时立足全面性和全局观，研究问题过程中采纳多种研究方法，解释问题时分析和汲取更广泛的理论，从三个方面支撑起了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使跨学科研究成为可能，并使之能够产生更有解释力的研究成果。

人类学是一个广泛的学科，人类学最显著的特征正是其广泛的研究领域，包括人类这一人类学最主要的研究对象，人类学研究活着的和逝去的、“原始的”和“文明的”人类；研究人类的不同方面，人类的肤色、家庭生活、政治体系、工具、人格类型和语言等。所有的时空都纳入了人类学家的视野；从基因到艺术风格，人类的各方面都在人类学家的关注中。^② 因此，尽管也有人注意到人类学在侧重生物和侧重文化两种不同学术关注点之间难以弥合的差异，但是在美国学术界通行四分支的人类学学科组

^① 潘光旦：《说本》，载《优生与抗战》，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年。

^② 詹姆斯·皮普里斯（James Peoples）、加里克·贝利（Garrick Bailey）：《人文学：文化人类学导论》（*Humanity: An Introduction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P. 2，St. Paul: West Publishing Company, 2nd ed., 1991.

合模式。一些学者认为可以通过考古学、语言学、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等几种不同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不同社会文化，从而使人们能够更好地对这些社会做出解释。当然，人类学家有着完全不同的兴趣，也几乎没有一位人类学家是人类学所有分支或人类各方面的专家。在许多情况下，在美国人类学界的四分支紧密结合可能也存在问题，即使在同一个人类学系中，除了学生的课程学习之外，各分支在学术研究层面上的结合往往难以真正做到，甚或会存在不同分支之间的矛盾。不过，四分支结合的学术训练对学习人类学的学生来说确是受益匪浅。通过这种训练，学生可以在一种陌生文化中很快地适应，并利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从各种不同角度广泛搜集这个社会各个方面的资料，从而对所研究的社会文化做出诠释。人类学作为一个包括若干分支学科、覆盖面很宽的学科，由于它的综合性，使得我们能够理解漫长的人类社会所经历的生物、技术和文化发展。经过人类学系训练，从事考古学、语言学和体质人类学的学生和学者也能够从更广阔的视野中去理解所研究的文化、族群。反观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除了中山大学在四分支结合方面较为重视并在研究中有所实践之外，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其他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尽管也不乏积极的努力，但相比较而言，显然缺乏对四分支结合的更好的理解和组织，在学术训练过程中有关知识的欠缺，有可能影响未来的研究者在学术理论和方法上更好地采用综合取向。当然，中国学术界一向也有西方训练中所欠缺或薄弱的另外一些内容，如历史学方面的训练。许多学者认为，在空间性与时间性上结合的研究在讨论中国这样复杂而历史文献记载丰富的社会时，似乎更有解释力。

潘光旦先生在国民性研究方面颇有建树。在解释国民性的形成问题时，许多学者注意到适应（adaptation）现象。适应这一概念在人类学中是指：一、基因频率的变化，在一个特定环境中

生活的群体由此获得生殖优势；二、心理及社会文化的变化，在此过程中个体的健康和幸福得以提高。适应的概念是生态人类学的中心，虽然其他人已经将适应仅仅看成是行为的和历史的过程，但是，一些学者一直在强调进化和基因适应（涉及自然选择的随机过程的一种缓慢的群体层面的过程）。人们都承认，包括人类在内的个体生物都会对他们的环境作出反应。通过形态和功能的调整，个体能够对他们生活环境中的变化作出反应。不过，人类学家对适应概念的解释并不一致。某些观点暗示着人类在克服生态强制力方面的无能，但是现代进化理论和遗传学已经肃清了环境决定论的简单化观点。生物体的功能和形式可以通过对个体的复杂互动过程仔细地反复考察来进行理解。通过遗传基因物质从一代到下一代的传递，所有生物体，包括人类的适应的变化得以传递。生物适应是很难完美无缺的，它还受到诸多因素的阻碍，包括突变和基因流动、进化的机会、自然限制、分配的问题及每次环境性质的变化。一个群体无论能够怎样很好地适应，在一个群体中的新的偶然的突变（和行为差异）发生以及被有规则地推广和扩散导致了变化。适应基本上是一种妥协。结果很少是“最适度的”解决，而被认为是机遇、竞争和机会。这是因为环境总是在变化，群体总是在吸纳着创新的行为的、心理的、发展的和遗传的形状，而且他们的互动十分复杂且大部分是无法预言的。随着强调“历史生态学”的出现，这种适应的互动规模近年来已经前进了一步。这项研究认为，人类行为可以而且完全能够克服“环境的限制”。因此，在贫瘠土壤中生活的群体可能通过在劳动力分配、技术技能和政治目标等方面的改变来改善经济状况。人们也在承认，不仅人类对环境为人类提供的东西进行适应和调整，而且他们也在试图改变自然环境对人类的冲击。这不仅仅是一种由当代技术的威力而获得的新能力，自人类起源的时候起，它就一直存在，并且能够在诸如筑梯田、打田垄、覆盖地面